

新加坡职业教育融入“终身学习系统”的过程与机制研究

林杰 刘业青

[摘要]作为经济腾飞、社会稳定的基石,新加坡的职业教育历经生存取向、效率取向与创新取向三个发展阶段。21世纪,为适应职业流动、技能更迭常态化的未来趋势,新加坡以职业教育融入“终身学习系统”的策略回应,深耕人才培养的三个维度:以制度融通协同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实现发展的广度;以技能框架协同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实现教育的长度;以无界文化融合职业教育与社会生活,实现学习的深度。

[关键词]新加坡;职业教育;三教协同;终身学习

[作者简介]林杰(1975-),男,安徽滁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教授;刘业青(1997-),女,河南鹤壁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在读博士。(北京 100875)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2年教育部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新加坡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2IICEZS01)

[中图分类号]G719.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4)07-0094-08
DOI:10.13615/j.cnki.1004-3985.2024.07.012

一、引言

职业教育是新加坡人才立国战略的关键环节。新加坡政府始终高度关注职业教育,其职业教育发展迅速,短短数十年便取得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成效。2022年新加坡教育部长关于《终身学习:自信面对新明天》的演讲,揭示了新加坡教育变革的信念与奥义,即终身学习。新加坡职业教育的实践主线正是构建一个以终身学习理念为基,服务全民职业生涯终身发展的教育支持系统。终身学习的概念并不时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加坡之所以选择这一理念来改造职业教育,主要原因是职业教育过去秉持的“终结性”技能观已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及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所需。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只有具备终身学习力的成长型劳动者,才能在未知与变迁中持续保持职业胜任力。为匹配

职业变动与转换的常态化趋势,新加坡政府、学校、市场纷纷加入支持职业教育终身化的行列。

终身学习脱胎于终身教育^[1],二者往往被混同,导致终身学习延续了终身教育的“刻板印象”:要么聚焦于学校教育之后的继续教育、成人教育阶段,暗含割裂学校教育 with 继续教育阶段的预设;要么视终身学习体系为不同教育阶段的“拼盘”,见整体而不见内在关联。这造成终身学习的教育主体泛化,使学校绕开了推动终身学习的责任^[2]。由此导致终身学习“承诺多于实施”,未能有机地衔接于各级各类教育中。

事实上,职业教育是实施终身学习的主要平台之一。近十年,新加坡以终身学习理念整合教育体制,成功建立多通道成长、多形式衔接与可持续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使得职业教育成为“终身学习系统”的参与主体,连通高等教

育、继续教育。而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协同发展也正是我国职业教育变革面临的最新挑战。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在巩固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基于此,本研究主要聚焦两个中心问题:首先,新加坡职业教育为何向“终身学习系统”演进?其次,如何通过三教协同将职业教育发展融入“终身学习系统”?同时,从南洋理工学院的案例切入,尝试透视其实践机理。

二、新加坡职业教育融入“终身学习系统”的动因与过程

过去60年,新加坡的职业教育并未线性演进,而是以接续不断的重估与变革为标志,始终追求青年学生比上一代人接受更好的教育。当前,新加坡职业教育参与“终身学习系统”的动因与旨向,与其职业教育变迁的过程密切关联。

(一)生存取向(1959—1978年):保障职教生源,形成培训认证

1959年,新加坡自治之初,只有两所技术学院和一所职业学院。当时,新加坡外部强国环伺内部一盘散沙,国土狭小且自然资源稀缺,极端的生存条件下,人力资源是其唯一能利用的资源。因此,新加坡确立了“人才立国、人才兴国”的国家观念,而有效的职业教育体系是实现其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的关键一环。

早在独立前夜,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即展开一项全国性职业与技术教育调查,收集到创立更多职业与技术学校的建议。当时,新加坡国贫民弱无法自给自足,严重依赖跨国公司,通过提供廉价劳动力,出口低技术含量产品维生。为解决低技能低工资招致的高失业率问题,李光耀主办经济发展局,授权其改革、壮大新加坡的制造业,改善新加坡技术人才的就业环境与支持条件。1965年,新加坡主权独立,教育担负改善国民素质的重要使命,提高基础教育

入学率,扩大学校规模,增加教师数量等一系列“扫盲”措施如火如荼。但彼时,新加坡约90%的中学毕业生选择学术教育^[3],悬殊的生源导致产业工人短缺。为改善教育失衡,新加坡开始将职业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战略高度,1968年成立技术教育部,整合职业与技术培训,领导一项重大改革:职业学校转化为更专业的职业学院或与学术类学校合并,改变原有的中学课程,技术培训为前两年必修,加入培养学生职业兴趣的内容。

职业教育占据教育系统的一席之地后,提高与保障技能水平,形成认证体系成为重点。1973年,新加坡成立工业培训委员会,接管技术教育部的职责,不只统合政府各相关部门,也加入企业雇主、劳工代表,向各专业和技术领域的领导者咨询培训需求与课程设置,制定了简要的技能资格认证,并引入学徒计划,与跨国企业成立联合培训中心。1979年,该委员会和成人教育委员会合并为职业与工业培训委员会,统领各阶段职业教育,通过考试与认证,将职业培训系统化、专业化。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新加坡尚处于劳动密集型的低生产力水平阶段,职业教育初创,保障劳动力、解决就业与培养技能是其主要任务。教育分流制度也尚未形成,所有学生参加统一的国家考试,所有学校均为公立学校。

(二)效率取向(1979—1999年):确立职业教育制度,提升学校培养质量

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石油危机波及新加坡,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弊端显露。新加坡政府意识到,只有加入高科技世界,提供各国争相支付的高附加值产品与服务,才能改变现状。由此,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一方面,通过税收与福利吸引优质国际企业与人才;另一方面,注重培养本国的中级、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以降低对外来人才的依附。教育的使命由数量转质量,由规模至效率。不仅要延续扫盲时期对基础文

化课程、师资、职业培训的优化,还触及教育制度的根本性变革。1979年,为选拔精英人才和培养高技能劳动力,新加坡放弃了早期“一刀切”的教育体制,执行普职分流、多轨并行的全新教育制度,支持学生差异化的需求与灵活的就学选择,对职业教育的地位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

20世纪80到90年代,新加坡职业教育将重点定位在健全制度轨道,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首先是理工学院,作为介于简单技能(低层次职业教育)与复杂智慧(大学)之间的“骨干”,主要培养具有专业性与领导力的工程师,使新加坡能进入并主导一个又一个高新科技产业。此前,新加坡仅有新加坡理工学院和义安理工学院两所专科提供文凭教育,且囿于工程、建筑类专业,后拓展至管理、财务、计算机与软件技术。由于两所理工学院的培训结构不能满足多类型产业的人才需求,特别是急遽扩张的服务业,因此淡马锡理工学院和南洋理工学院于1992年、1994年相继成立,涉及零售、酒店、媒体、护理等领域,实现职业教育的多样化。其次是技术教育学院,作为衔接教育分流中的技术一维,其定位于培训高水平、高素质的技工,实施高层次的技能课程。1992年,经职业与工业培训委员会重组,技术教育学院作为职业教育新模式诞生。它突破传统的技术训练,采取品牌树立、竞赛激励、就业服务与升学培训、校园设施升级等多重现代化手段改造教育,克服了职业与技术教育长期遭受的巨大偏见——学业失败者的归宿。新加坡学生在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技术教育学院与理工学院的比例约为25%、25%、40%^[4],其余10%为另外选择(直接就业、留学等)。

这一时期,职业院校的教育质量也得到根本改善。新加坡引入德国的教学工厂与双元制,广泛应用基于真实情境与问题的在职学习方式。理工与技术学院不仅在校内创设工作环境,也与企业合作开展实习计划,甚至与跨国公

司合作培养^[5]。高等教育方面也对提高人才素质予以支持,南洋理工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向顶尖职业学院毕业生敞开。新加坡职业教育在该阶段整体驶入快车道,实现了政府培养高水平技术人才以维持经济增长的预期。

(三)创新取向(2000年至今):构建终身学习体系,塑造未来职业胜任力

新加坡职业教育第二阶段采用的发展战略亦非长久之计。一方面,资本与技术密集型模式下,职业教育受企业需求主导,所培养的劳动力仅能充当经济市场的“零部件”,不具备主动引领变革、创造需求的特质,不匹配知识经济对创意与创新服务的希冀。另一方面,全球化渗透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从劳动力密集型迈上高科技产品生产的附加值阶梯。新加坡政府意识到,立足未来必须供应其他国家难以复制的产品与服务。因此,21世纪的新加坡以建成“一个以创造力、创新和研发为基础的经济体”为目标,展现出担当国际金融、贸易与人才枢纽的雄心。为培养胜任新时代的创新人才,新加坡开创了“思考型学校,学习型国家”的新愿景。

人才培养观的转型使终身学习成为新时期新加坡教育的核心原则。终身学习不仅被正式纳入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名校的育人理念,也在职业教育侧越发凸显。对社会而言,职业教育终身学习系统的建构既是辅助人才与技能始终匹配时代变迁,以维持经济韧性的需求,也是新加坡劳动力结构老龄化威胁下充分开发人力资源的现实对策,同时还有一个东亚传统文化的诱因:大学教育、学术文凭仍然是许多家庭的不懈期望,即使是平庸的大学。因此,为从事技术技能的学生提供终身发展的图景及其配套服务,将有益于保障技术劳动力生源^[6],进一步改善职业教育口碑。对个人而言,知识密集型经济及产业智能升级的全新背景下,某一职业的获得只是暂时成果而不是终结^[7],必须持续学习以提高终身就业能力。这也迎合了20世纪末的

国际职业教育观念转向,新职业主义更关注个体的持续发展能力,而不仅仅是社会效率^[8]。因此,新加坡新时代的职业教育发展方向是开发每个人的潜能,确保学生进一步学习和升级,为未来就业做准备。不同于只聚焦正规的职前学校教育和职业准备的传统,新时期强调扭转继续教育的边缘地位,健全职业终身学习路径。

首先,兼顾职业发展的长周期,打破职业教育“天花板”,保障升学。以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社会科学大学为代表的理工与社科大学,设立应用学位,使大学教育与理工学院学生、在职人士与成人学习者的技能升级需求保持一致。其次,增设教育主体以扶持职业继续教育。2014年,新加坡设立理工学院与技术教育学院应用研究评估机构,帮助职业学生开拓学术与就业前景,提供更多途径深化其现有技能和获得新技能。同年,新加坡继续教育与培训计划被更新,制定了提供广泛而高质量的继续学习机会,发展雇员技能以保持就业能力的主要规划。最后,健全巩固职业终身发展的制度。2005年,新加坡人力资源部推出一项全国性技能认证标准——劳动力技能资格,其保障职业培训质量,匹配企业与市场需求,为学生职业技能发展建立参照,并相应投入培训经费补贴。2014年底,新加坡政府成立未来技能委员会负责实施《未来技能》框架。因整合了先前的培训与认证制度,该框架的系统性史无前例。新加坡人无论处于求学、职业早期、中期还是退休阶段,都能根据《未来技能》框架形成进一步的技能学习指南,包含各专业的学位、文凭、半工半读与勤工俭学等多项选择,以实现服务个体终身自我发展的核心功能。

三、新加坡职业教育融入“终身学习系统”的特征与机制

2022年,新加坡教育部提出建设有竞争力的国家和有凝聚力的社会的新愿景。在新的阶段,新加坡聚焦广度、长度和深度三个方向,使

职业教育融入“终身学习系统”:教育系统内,与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三教协同,超越狭义成功和学历导向;教育系统外,与社会生活融合,超越正式教育和课堂空间^[9]。

(一)发展的“广度”:以制度融通协同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

“广度”基于横向视野,主要是确保教育系统开放而包容,使所有学生能够有机会探索兴趣、发现天赋,体验多种途径。若职业教育是脱嵌于教育体系的单行道,一次入学便永久错失改变人生境遇与社会地位的机会,那么必然难以改变“考试失败与落选之路”的刻板印象。因此,“终身学习系统”的第一项构成要件就是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融通的制度路径。

新加坡教育以早而严格的分流著称,极早分流旨在高效配置教育资源和选拔人才,但也可能将学生框在一条轨道,抑制多元的潜能与需求。考虑到这一点,新加坡政府在坚持任人唯贤的同时,又坚定地帮助每个人成才^[10],以可转换、进阶与组合的制度机制,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驾齐驱”,使每个学生就业有能力,升学有基础。具体而言,新加坡的普职“立交桥”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职业教育体系完整,阶梯清晰可循。学历不止步于中等教育,而是融通高等教育,可获得学位,拾级而上。以护理专业为例,老龄化社会中,入院患者多为年事已高的慢性病人,他们的病症复杂多样,护士要应对的不是某一病型而是综合护理,并且患者及其家属受教育程度提高,期望知晓更多疾病与医疗的相关信息。仅靠某一学段的短暂教育,显然难以胜任综合的疾病照护和最新的医疗进展。2006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成为首个设置护理学士学位的本科大学,此前均由海外高校提供。护理学位教育的本土化是新加坡迎合老龄化趋势,创建亚洲健康中心的战略举措。自此,新加坡本土完整的护理教育体系得以逐步建立,目前已经囊括

技能证书、文凭、学士学位和研究生学位。

第二,理工学院是职业教育进入与转出的枢纽,充当教育系统的“中转站”。新加坡的理工学院有别于我国的高职院校,性质特殊。一方面,其学校层次与教育质量高,职业中学与普通中学(技术偏向)毕业生并不能直升理工学院,而是需要通过2年技术教育学院培养,获得含金量颇高的国际技术资格证书;另一方面,理工学院身兼研究与应用、升学与就业的综合定位,并非狭义的职业教育机构,新加坡中学毕业生约40%进入五所理工学院。其毕业生也是大学应用人才的储备,不仅能直接就业,也能输送到大学。南洋理工学院的护理专业,下接职业中学、技术教育学院,上通新加坡国立大学等高校,可将护理人才培养成研究型、教学型、临床技术型甚至管理型高级护理人才,取得高层次学位。同时,鉴于其许多文凭课程过于专业,不易与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学位教育匹配,南洋理工学院还积极与海外名校合作,如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设有研学交流和学分转换项目^[11]。护理教育的学习路径双向流动,学生既能向上升学位,也能向下深技术。南洋理工学院毕业生可“下沉”至技术教育学院进修专业技能,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毕业生若立志成为护理人才,也可至南洋理工学院、技术教育学院补习,获取专业证书。

第三,职业教育选项“最大化”。无论处于分流中的哪一阶段,职业教育均向所有学生敞开,各类中学与学术偏向的学生均可向理工学院甚至技术教育学院流动,学习职业技能。新加坡创造更多机会流入职业教育的制度设计,传达出学术成绩和教育身份不再是“成功”“精英”的象征^[12],用手、用脑、用心都能够出类拔萃的社会观念。在此理念影响下,新加坡成为亚洲唯一总体多达七成学生选择职业教育的国家^[13]。新加坡保持了理工学院与大学的双元结构,并未走上职业院校升格大学^[14]的道路,而是

坚持职业教育的禀赋,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甚至高于普通教育,理工学院与技术教育学院的生均经费相当于学术轨同等位置学生的1.2倍^[15]。

(二)教育的“长度”:以技能框架协同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

“长度”指纵向的时间线索,学习不因走出校门而停止,教育应当为走出校门的人继续提供学习机会。一个充满活力、健康且持续发展的社会,职业教育成就的衡量标准不仅是毕业生的成功就业,也关涉个体继续教育、职业发展的机会^[16]。21世纪新加坡政府扭转继续教育与培训“非学位、非权威”的边缘地位,从强调职前培训转向继续教育,从关注高等教育入学率迈向终身学习参与率,将衔接继续教育作为新加坡职业教育参与构建“终身学习系统”的关键一环。而全民终身学习的国家级战略框架——《未来技能》的发布实施,是新加坡职业教育发展的里程碑。此前,新加坡的职前教育阶段依赖普职融通型教育制度升学、转轨,职后继续教育阶段依靠劳动力资格认证对接资历与学历。而《未来技能》将二者统一于个体的职业生涯,聚焦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协同发展。

第一,《未来技能》由政府与企业、行会、教育机构共同研制,要点在于强调终身学习、技能深化和职业发展,主体内容是搭建基于职业生涯的技能框架,廓清社会各行业的职业进阶路线、可转换的方向、实现这些所需的技能及其教育途径。对于每个新加坡公民而言,技能框架是一个“终身地图”,不论所处的职业阶段(求学、就业、待业或退休),个体均能依据既有资历或学历定位自身,洞悉职业前景,发掘职业兴趣和目标,定制个性化职业蓝图。对学生而言,技能框架寓含隐性教育功能,引导并帮助他们自我迭代、自我革新,以个体为中心,实现自主的终身学习。将教育体系与个体职业进阶联结,直接激励个体持续学习,改善既往的终身教育建制重在提供发展途径,忽视个体投入终身学

习的动机、效益考量,避免陷入铺设学习渠道却难以提升学习参与度的困境。

第二,《未来技能》以职业教育与继续培训为核心辅助,并联合企业、学校提供进修资助。教育是职业攀登与流动的主要实现途径,许多高校和专业协会参与其中,自发启动正规教育机构向终身学习机构的转型。南洋理工学院针对在职人士设置类型多样的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课程,涉及专业文凭、高级文凭、半工半读项目、转换文凭、证书课程和其他短期课程等,回应各类职业教育与继续培训诉求。其中,转换文凭服务于在职人士进入新行业或转岗。例如,护理职业就设有五类选择:注册护士、执业护士、身体治疗师、专业治疗师、放射诊断技师。以注册护士为例,个体经由职业学校获得相应文凭或学位,成为注册护士。工作中,可先根据技能框架,判别自身所处职业发展阶段与层次,进而设定个性化目标。假设其理想岗位为更高级的“护士(临床型)”,可以根据技能框架的指南,找到这一层级的职位要求,明确各项技能与能力指标。然后,通过对比注册护士与护士(临床型)的技能标准,完成自我评估。之后,结合个人实际确定职业教育途径及资助,以胜任目标岗位需求。若缺乏工作经验和技能基础,则系统化进修护理学位、高级护理文凭;若具有工作经验和资历,则可完成针对性的课程模块,精准弥补技能差距。

第三,《未来技能》以学分账户为配套措施。学分账户的功能是识别并记录个体整个职业生 涯的学习,在推进职业教育的“微认证”与“可堆叠”路径中扮演重要角色。传统的高等教育试图在三四年间,教授学生立足未来三四十年 的知识。但是,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人一生可能 历经数次职业变动。世界经济论坛预估,全球 近一半行业技能将在未来五年更新。适应社会 变化,一些非学历技能证明包括多样、灵活的微 证书,有望成为学生职业生涯的必需品^[17]。尤

其是在职场压力大、工作节奏快的当下,抽出完整时段长期学习绝非易事,微证书凭借低成本、小而精的优势脱颖而出。在新加坡,许多微型、模块化培训项目已纳入认证。伴随职业终身学习的制度化与正规化,个体堆叠、组织各项培训课程、项目与活动以达成新的职业目标,将更为普遍。例如,为应对新加坡日益严峻的老龄化态势,南洋理工学院专设人才缺口最大的老年护理项目,并在护理专业增设多元教育项目,为病患家属、低学历移民、相关行业人士敞开进入或转入护理行业的培训途径。

(三)学习的“深度”:以无界文化融合职业教育与社会生活

“深度”概念是从立体维度填充终身学习,不拘泥于特定时空,指向教育过程与质量。现实中,在职培训往往不足以应对工作情境中复杂的需求^[18]。即使在职业教育最发达的德国、瑞士等国,那些早期接受职业培训的工人也容易在职业生涯后期面临严峻挑战。这就需要借助无界文化来融合职业教育与社会生活,以“学习—工作—生活”融合的视域引导个体坚持终身学习,在更广阔的环境中锤炼职业素养与能力。

在“学习—工作”融合方面,新加坡职业教育的发力点主要有二:一是强化人才培养与工作的有机结合。学徒制、教学工厂、项目学习、半工半读、实习等教学模式长期占据新加坡职业学习的重心,尤其是继续教育阶段,以技术教育学院的半工半读课程为例,在职培训时间占比达70%^[19]。二是保障教育中的社会参与。新加坡职业教育的课程设置由人力部、教育部、贸易和工业部、经济发展委员会等多部门决策,涵盖各类企业代表,且许多学校与企业界密切合作,设置专业咨询机构,将行业与企业建议置入课程开发、培训项目、考核标准^[20]。

在“学习—生活”互渗方面,主要是推动个体在整个职业生涯周期中主动学习,完善相应理念和制度支持。理念上,新加坡深谙经济增

长和个人成就的良性循环,不仅依托制度的支撑,更依赖彻底的思维变革,使终身学习从一种选择变为一种必需,镌刻于各类院校的治学目标中。制度上,多种形式的自我教育是使个体在真正意义上充分实现自我的手段^[21]。新加坡教育部及劳动力组织为所有公民提供在线课程、就业技能研讨会、生涯指导等资源和服务,职业院校也注重营设自主学习、创新的环境,以数字技术赋能,如建立在线导师(E-Tutor)系统和在线社区,以个性化、交互式媒体技术支持学习^[22]。

以南洋理工学院为例,无界文化具体显现为护理教育“重专业基础素质、重实践、重综合活动”的特征,指向学习的迁移、应用与综合创新能力。南洋理工学院的护理课程分为核心模块和选修模块,分别作用于巩固专业基础和拓展思维视野。核心模块不仅包含护理学专业基础和专业的跨学科课程,还设置了大量与工作、生活相关的职业能力课程,如批判性思维与研究、有效沟通技巧、创新与创业基础等。同时,实践占据护理课程核心模块的重心。相比理论性课程45个、60个、75个的学时,实习与实践学时往往达到120个、400个学时,第三学年甚至高达1000个学时。实践课程在每个学年作为核心必修,不仅利于知识应用,还适应从学生到护士、学校到医院的转变。在三年制教育中,这类课程的学时比重递增,以学徒制为载体,通过医院、社区、海外机构实习辅导,还加入实验项目、循证实践等研究性实训课程。此外,国际交流、非正式活动也是无界学习的运作载体。南洋理工学院的学校生活中,课堂与课程只是一部分,激发学习热情的氛围与资源无处不在,如案例分析、分组研讨、企业考察、仿真模拟学习等活动形式,俨然一个大型学习生态圈。

四、结语

新加坡选择一条坚守职业教育特色之路,不寄希望于以双轨制方式破解职业教育的“天花板”之困,而选择教育体制的融通,构筑服务

个体职业生涯终生发展的制度体系,从广度、长度、深度融入职业终身学习系统,竭力优化职后继续教育与职前学校教育的衔接,工作经验、培训等资历的认证,职业转换与生涯指导。此前,新加坡职业教育关切学校教育阶段,建成普职“立交桥”,与高等教育双向融通:职校生可凭相应文凭或资历升入一流大学攻读本科或研究生学位,而许多学术型中学生也选择升入理工学院,学术型本科生也可“逆入”职业型学院加持技能证书。而今,关切学校之外和学校之后,即以无界文化培养人才,联通社会教育;以《未来技能》框架及其职业指南、微课程与证书等继续培训项目、劳动力资格认证,接轨继续教育阶段。职业教育完成三教协同,融入一个宏阔、可持续发展的“终身学习系统”,不仅有益于个体适应未来社会与市场,也有助于克服唯学历论与职教歧视。因此,新加坡职业教育享有不逊于普通教育的稳固地位。

当前,许多国家职业教育的共同发展趋势是重心后移,移向高等教育、继续教育,但路径有别:一类思路在“分”,发力点在提升职业教育的学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各顶半边天,导向双轨制;而新加坡思路在“合”,指向增强职业教育连通性,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撑一片天,维持分支型。这与新加坡的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相关,在普职融通基础上,紧要事项不是另建与普通教育趋同的职业教育学位和大学,而是应对21世纪产业与技能急遽变化的挑战,以及老龄化危机下最大程度开发人力资源。对此,新加坡选择为职业人才终身适应市场提供一套多通道、可持续的教育体系,使凝结于教育培训与工作经验中的技能和资历流通于市场,受社会认可。

当然,新加坡的职业教育终身化路向有其社会条件。新加坡政府长期鼓励“乐龄”工作、老有所为,就业市场与职业发展对年龄包容,不设制度门槛。若就业环境与劳动保障制度存在年龄关卡,将很难适应职业教育终身化、可持续

发展的愿景。此外,由于新加坡职业教育参与构建终身学习系统的战略尚在进行,改进空间犹存。例如,相比德国、瑞士等国,新加坡的企业参与度仍待提升;劳动力资格认证也尚未与东盟各国的资历框架对接,不利于广聚国际人才。☞

[参考文献]

[1]吴遵民,谢海燕.当代终身学习概念的本质特征及其理论发展的国际动向[J].继续教育研究,2004(3):31-36.

[2]李明明.中国特色的终身学习理论探索与创新——重读郝克明的《跨进学习型社会》[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4,12(1):175.

[3]Singapore Infopedia.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EB/OL].(2019-06-14)[2023-09-28].https://eresources.nlb.gov.sg/infopedia/articles/SIP_2019-06-14_155946.html.

[4]Tucker M. The Phoenix: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Singapore [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y, 2012: 36.

[5]金岳祥.新加坡的经济增长和职业教育[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1(3):42-44.

[6]Varaprasad N. 50 Years of Technical Education in Singapore [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56-58.

[7]肖龙,陈鹏.为了职业,还是通过职业——智能化时代职业教育变革的方向抉择[J].高等教育研究,2020,41(2):52.

[8]石伟平,徐哲岩.新职业主义:英国职业教育新趋向[J].全球教育展望,2000(3):47-51.

[9]UNESCO. Singapore Education for All 2015 National Review [EB/OL].(2015-05-22)[2023-02-09].<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229877>.

[10]Xi LU. Analysis of Difficul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Gener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Comparison with Singapore Education Streaming System Diversion Policy [J]. ISEMSS, 2022: 852.

[11]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st of Acceptable Diplomas from Nanyang Polytechnic [EB/OL].(2023-02-02)[2023-09-09].<https://www.nus.edu.sg/oam/docs/default-source/admis->

[sions/nanyang-polytechnic.pdf?sfvrsn=48ee8268_4](https://www.nus.edu.sg/oam/docs/default-source/admissions/nanyang-polytechnic.pdf?sfvrsn=48ee8268_4).

[12]卿中全.新加坡职业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J].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16(6):19-24.

[13]Varaprasad N. 50 Years of Technical Education in Singapore [M].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62.

[14]Bin Bai, Paryono.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 ASEAN Member States [M].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2019: 183.

[15]Research Office 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 Voc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Germany and Singapore [EB/OL].(2022-06-24)[2023-09-28].<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english/2022in01-vocational-and-professional-education-in-germany-and-singapore-20220624-e.pdf>.

[16]Seng D L S. Vocational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J]. ITE Paper, 2007(9):4.

[17]麦可思研究.重磅!《中国-世界高等教育趋势报告》正式发布 [EB/OL].(2023-03-07)[2023-02-09].https://www.sohu.com/a/650593235_121294.

[18]Sreeja Nair, Sun Sun Lim, Brigid Trenerry, et al. Preparing for Workforce Transformation in Singapore: the Role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EB/OL].(2021-08-26)[2023-02-09].<https://medium.com/digital-asia-ii/preparing-for-workforce-transformation-in-singapore-the-role-of-technical-and-vocational-education-526d4b1c6422>.

[19]UNESCO. TVET Country Profile—Singapore [EB/OL].(2020-06-01)[2023-02-09].<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3700?locale=en>.

[20]关颖.高职机电类专业项目课程开发与构建策略——对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课程开发与构建的经验借鉴[J].辽宁高职学报,2009,11(7):49-51.

[21](法)保尔·朗格朗.终身教育引论[M].周南照,陈树清,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44.

[22]Seng D L S. Vocational Technic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Singapore Experience [J]. ITE Paper, 2007(9):15.

(栏目编辑:孙苹)